

作家写作家

姚茂椿：
初心归来映霞光

金中基

立冬刚至,姚茂椿带着新近出炉的诗集《霞光漫过》,还有早先的《放飞》《苍山血脉》《和吟声声》诗歌散文集子,急匆匆地踏上归途,返回故乡新晃,捐赠给县档案馆和县图书馆,将这几十年用心血挥洒的文字,永久地留存在故乡。

“新晃是我的胞衣地,也是我的文学原乡。”问及为何有此举动,姚茂椿饱含深情地说,“我的血脉和文字的源头都在故乡。”

30多年前,风华正茂的姚茂椿,走出乡关,还是个文学“愣头青”,随身携带的大木箱里,是一堆朴素的、单薄的内刊。那个墨香味,他永远都忘不了,在心里飘荡了一辈子。

这些内刊虽不知名,甚或主编亦未必专业,却是文学草根生长的沃土。姚茂椿早期的作品,就是发在县文化馆编的《溇水文艺》上。那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篇章,如同他在一首《无名树》诗中写道的一样:它肯定有过姓名,很久以前,一定很美。但现在,谁也叫不出它的姓名。

当年,姚茂椿也曾亲手编过内刊,那是在新晃乡下扶罗中学教书之时。他见同学们写作热情高,便萌生了办刊的念头。谁知,他把想法向校长及语文教研组长一提,他们非常赞同。

征稿启事一发,散文、诗歌、小说等如雪片般飞来。这些身处边远大山里的学子,创作激情和对文学的渴望,是多么狂热。他与几位老师,从中挑选20多件作品,加班加点刻印成册。

这本内刊叫《花街》,编印于1983年5月,虽仅出一期,却让他铭记至今。封面由教过他的杨老师设计,草书“花街”二字苍劲,花间蝶舞,一只小梅花鹿好奇探首,一条蜿蜒小径静静伸向远方。翻开扉页,是一段寄语,姚茂椿至今记得开头两句:

“我们踏着故乡的花街,从山里来了,摘来嫩柳枝头那片清新。

我们在洒满阳光的山塘,投下一颗希望的石子,溅起一片理想的涟漪。”

在那个文学炽热的年代,这些小内刊犹如旷野中倔强生长的小草。姚茂椿不仅在这里耕耘文字,种下文学的种子,更结识了一群文友,互学见长。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从母校调入县城不久的孙南雄老师。孙老师在散文《火铺》里写道:在山区的侗家,没有一户人家没有火铺。为什么叫火铺,只是因为有一个火塘。一走进侗家屋里,乡亲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上火铺”。他的《跟着小河走》,写的正是天天相伴的平溪扶罗河。姚茂椿读来倍感亲切,也深受触动。两人之后成了忘年之交,在小城传为佳话。即便后来孙老师年过八旬、居于湘潭,姚茂椿仍专程前去探望。

当年家乡的龙溪诗社,成员较多,影响较大,在全国、全省的征联征诗活动中屡获奖项,诗联经常登上报刊。新晃由此成为“中国诗词之乡”。姚茂椿至今珍藏着一本《龙溪诗讯》,时常翻阅。其中序诗《欢迎侗族文学会在新晃召开感赋》:“当家自治五旬年,侗汉苗回创大千。溇水清澄融瀚海,晃山苍翠绚坤乾。欢迎侗学文研会,喜结诗乡翰墨缘。社会和谐春永驻,与时俱进绘宏篇。”作者姚本星,时任县委副书记。姚茂椿曾听他作报告,讲退耕还林,满口乡音土话。一场报告下来,百姓心领神会。姚茂椿却从这朴素的土话中,听出了诗意。这些乡音乡情,也成为他日后创作中丰沛的源泉。

“小时候做农活或走亲戚,走在午间燥热的路上,口渴去到泉井边,看到井边放有竹瓢,有的水里放有青草打的结。”姚茂椿说,“这个草结就是草标,它提示井水安全。”于是,他在《我的胞衣地》组诗一首《草标》中写道:“路标,像灵泛的山娃,为远行的足迹指引;并标,像轻盈的姑娘,在泉井舞蹈;界标柴标,是威严的寨老,令所有邪念退回。”

我与姚茂椿初识于怀化,一别数年未曾深谈。没想到,他在从政的路上,不止于“政论”,文笔更是“爆棚”。无论是下乡调研,或是驻点扶贫,一路吟唱,感怀抒情,初心不改,以独特体验,辟文学蹊径。

在长沙举行的《霞光漫过》新书分享会上,湖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著名诗评家草树认为,姚茂椿是一个“归来者”,相比博客时代的“归来者”,晚了20年,但年轻时代的诗歌火种,没有在他漫长的从政岁月中熄灭。从诗歌生态学来看,堪称一个奇迹。

(作者系湖南日报原编委、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姚茂椿,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诗歌学会顾问)

名家新作

浏阳烟花

何立伟



浏阳烟花。

何立伟 摄

立冬后隔了个把星期,长沙突然放晴,艳阳高照,天色瓦蓝,气温高达23摄氏度,正是所谓的“小阳春”。十五六号又恰是周末,于是我们几位老友相约了去浏阳看老段、晒太阳。

一路上阳光从车窗外射进来,坐在车内只有一个动作可以反复做:脱衣服。我看到田垅上远远走着的穿短袖T恤的人。

老段就是段江华,油画家,他在浏阳高坪镇把一个废弃的供销社改造成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乡村美术馆。开馆三年来,老段以一己之力将这里打造成了当地的文化名片。我每次来,都在他的美术馆里遇到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去年遇到的客人中,竟有从北京来的。

乡村美术馆门前就是小溪河,不远处,小溪河与大溪河交汇,当地人叫双江口,自此,哗啦哗啦流着的水,正式的名字就叫浏阳河。

而我在长沙的居所,不远处处便是浏阳河汇入湘江的地方。黄昏时分,我喜欢来这里散步,看灯光星光从水面跃起,在心中与空中璀璨。

我们坐在老段的乡村美术馆的露台上晒太阳,喝茶聊天,我脱得只剩一件衬衣,背上肩上是暖洋洋的。

我们也坐在小溪河边的村咖啡店里喝咖啡。同坐在城里的咖啡店喝咖啡相比,乡村咖啡的场景更是让一种乐趣替换掉了你的熟悉得近乎麻木的经验,你品尝到了咖啡因之外的另一种陌生的况味,你于是兴奋无比。

在浏阳,让人兴奋的事太多了,吃的、玩的、看的、听的,数不胜数。当然最让人兴奋无比的,是看浏阳的烟花。

老段安排我们晚上到天空剧院去赏烟花。

天空剧院是开放性的露天剧院,无顶棚设计,可容纳上万观众,就在浏阳河畔,以山水实景作舞台,与自然环境相融合。

我最喜欢的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在他的“墓志铭”里写过他的许多爱好,比如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梨园、好鼓吹等等,其中就有一好:好烟花。我猜他的这一好,就是好烟花的绽放之美、声响之美、喜庆之美、如梦似幻之美。而浏阳的烟花,那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享誉世界的中国文化名片。浏阳是全世界最大的烟花生产和出口基地,浏阳烟花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曾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北京APEC会议、G20杭州峰会、国庆庆典等众多的国内外重大活动中绽放,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烟花不可思议的视听魅力。

浏阳烟花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唐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据传是药王孙思邈在浏阳隐居时发明的。它的制作技艺已在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00多年的发展,至今品种繁多,从传统的鞭炮、喷花、旋转类到现代的礼花弹、组合花盆、舞台冷焰火、特效烟花等,应有尽有,且不断地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微烟、无硫、安全环保的新型烟花,并融合音乐、数字控制、无人机等技术,打造出了震撼人心的大型艺术焰火表演。从文化意义上说,烟花与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和重要庆典总是紧密相连的,比如春节呵元宵宵节呵总要放烟花,婚礼呵开业呵也要放烟花,它承载的是中国民间驱邪避祸、祈求吉祥的文化心理。

晚饭后从乡村美术馆所在的高坪镇双江口村到天空剧场,沿途到处是车,越往前走,道路两旁凡能驻车的空地都停满了车。快到

天空剧场,所有的路口只看到交警们在指挥疏通着缓缓移动的车流。我们说浏阳人真爱热闹呵。给我们开车的村支书老李说,不止是浏阳人哦,还有好多是从外地来浏阳看烟花的咧。

这台烟花秀,是结合了戏剧来燃放。剧中有三个人物,孙思邈、谭嗣同和屈原,都与浏阳的历史有关。逢到剧情关节处,烟花腾空而起,变化无穷,烘托着戏剧的情节与情绪。我们从看台望去,烟花的燃放点来自浏阳河的对岸。我拿手机拍烟花,回来后慢慢翻看,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纷呈,美轮美奂。后来夜天里还演绎了无人机群由电脑编程组成的龙的形象,真是奇巧得不可方物。到最后戏剧高潮时,空中群花怒放,银树琼枝,千变万化,恍入梦境。张岱在《陶庵梦忆》里写过一篇“鲁藩烟火”,文中有“端门内外,烟焰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句,形容烟火之盛,极是传神。张岱所写的鲁藩乃山东兖州城内的鲁王府,你想一想王府之烟花,再妙极,恐怕也不能同我们的浏阳烟花比。辛弃疾有《青玉案》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虽不是写的浏阳烟花,但是用来形容浏阳烟花在夜空中的绽放之美,真是再恰当不过。

这天夜里看烟花,场内万把人,场外人应是场内人数倍之多。我们回去,李支书说,平时从天空剧场到乡村美术馆,开车也就一刻钟左右,但只要放烟花,路上就堵得不像话,个把钟头都开不回去。买不到剧门票的人,都在外面的空坪隙地上看,那真是车如海,人如海,不要说天上的烟花壮观,地上看烟花的人,散场时的那种拥挤热闹的局面,同样也是壮观。

香英

徐亚平

赵元任先生,仿佛刚放下1938年记录昆明街头的相机,目光里藏着语言的韵律与远行的风霜。朱自清先生依旧背影单薄,眉头微蹙,仿佛仍在构思他未竟的文章。李公朴先生温文尔雅地笑着,这笑容背后,是一个民族最硬的脊梁。林徽因先生穿着素雅的旗袍,眉眼如新月般清秀,目光里却含着山峦般的坚毅。而徐志摩先生清俊的面容和眉宇间挥之不去的浪漫与惆怅,为这片空间平添几分康桥的柔波与云影。

在这独特的时空长廊中,我久久伫立,于这些疏朗的眉目与清亮的眼眸间流转。周遭游客的絮语渐渐退去,耳畔似乎响起了历史的回响。此刻,这书店不再是书店,它是烽火连天里一座倔强的文明堡垒,是破辟山河中一盏不灭的孤灯。

窗外,曾是呜咽的警报与弥漫的硝烟;窗内,这些民族的魂魄,正从一册册书中汲取不屈的力量。他们于烽火中衣冠南渡,在茅屋土墙间,将文明的火种小心翼翼守护、传递。山河重光时回望,他们种下的,何止是诺贝尔奖的荣耀与“两弹一星”的功勋?那更是一个民族在泥泞之中仰望星空的全部尊严。西南联大的历史,是一个关于勇气、坚韧、智慧与希望的故事,而将这些读书视为“天下第一等

好事”的大师,正是这个故事最动人的灵魂。

我的思绪正沉湎于这往昔的洪流中,却被一阵轻快的脚步声扰动。是远道而来的长沙劳模刘婷、汤烈,他们像发现了宝藏的孩童,眼睛亮晶晶的,在一排排书架间穿梭,寻到一本合意的,便倚着书架读起来,那份专注,仿佛周遭的世界都已与自己无关。

不一会,又见益阳来的劳模王东晖,痴痴地看中了书架顶层的旧籍。她扶着古朴的木梯,小心翼翼攀上去。斜阳从窗格透入,为其身影镀上金边。那一瞬间,她的身影竟与墙上梁启超、陈寅恪、钱穆、金岳霖、华罗庚等先贤的影像有了重合。恍然惊觉,那一代人,是为危亡的民族寻找出路,在精神的阶梯上艰难攀登;而我们这一代,或许是为安顿疲惫的灵魂,在知识的海洋里默默打捞。形式虽异,这份对书的虔诚、对精神的渴求,却是血脉里相通的温柔。我站在梯下,自然而然成了她的保镖,守护的与其说是她,不如说是这一刻的安宁而神圣的阅读时光。

离开时,暮色悄然漫上文明街的屋檐。回望这静默的书店,它像一位不言不语的智者。

历史的长河滔滔向前,从不因谁而停驻,我们总有些偶然掠过水面的面孔,终将随波逝去。但总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为河床下的基石,如同这书店,如同它所承载的“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精神。它无声地诉说着:无论时代如何喧嚣,那一等一的好事依然是读书。在书中,我们与过往的高贵灵魂相遇,也与内心那个纯真的自己,久别重逢。

储蓄罐

马珂

周末带女儿去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参观,16岁的她被陶艺作坊深深吸引,执意要体验一把制陶工艺。在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她完成了一只泥塑储蓄罐。付过费用待入炉烧制后再快递给我们。我问女儿为何要做储蓄罐,她说老师告诉学生要有储蓄观念。我听后颇感欣慰。

储蓄作为我国最传统的财富积累方式,在国人心目中既是最大众化的投资理财方式,也是抵御意外风险的基本保障。储蓄罐的历史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秦代称其为“蛭”,汉代称“扑满”。秦代《关市律》记载,“蛭”用于商贩交易时暂存钱币,是早期的储蓄罐;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扑满”的特点:“有人窍而无出窍”,即钱币装满后需打碎取出,故称“扑满”。满则扑之。

远古时期,储蓄罐多为陶制,腹部浑圆,投币口位于上方,少有装饰,体现古人崇尚节俭之风俗。

后受经济形势的影响,储蓄罐形制日渐多样化。如古滇国出现青铜储贝器,尤其是长沙窑出土的褐彩圆圈纹瓷扑满,带有提手和装饰纹样,实用与美观兼具。

我拥有第一只储蓄罐,是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年班级开展勤俭节约活动,要求人人需有一只储蓄罐,把平日不用的硬币积攒起来。我找同学要了一节两头密封的大南竹,自己动手用小钢锯在竹筒上部锯开一道能够塞入钢镞和纸币的口子,将平日里不用的零钱塞入竹筒储存起来。大半年后,同班的一位男生因重病住院,学校举行捐助活动,要求学生们助人为乐,献一份爱心。我回家后用刀劈开竹筒,将积攒起来的四元三角两分钱悉数捐出,获得了学校的表扬。

百姓把懂得储蓄的人称为最清醒和最自律的人。古往今来,有众多与储蓄相关的典故广为流传。《后汉书》记载,东汉名臣杨震,清正廉洁,一生不贪不占,他的子孙们为了传承这种节俭的美德,用陶土制作了一个圆滚滚的小罐子,上面开个小孔,专门用来存放平日里不用的钱币。等到罐子存满,将其取出用于扶贫救困。杨震的子孙们也因此受到百姓的尊崇,并载入史册,流传至今。

在老舍名著《骆驼祥子》中,储蓄罐不仅是祥子的存钱工具,也承载了他对生活的期待与梦想。每当祥子面临困境时,平时储蓄血汗钱的闷葫芦罐儿就会给予他鼓励和安慰,使他在艰难的生活中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着一件特殊的储蓄罐,是一根三尺长的大竹筒,虽已历经70年沧桑,却仍能看清“抗美援朝生产捐献集金桶”几个大字。资料记载:1951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人民开展武器捐献运动,通过增产节约筹集资金购买飞机、大炮等支援前线。这个大号竹筒储蓄罐,是湖南省湘潭县勸业工谭楚云老人为响应号召自制而成。他每天利用工余时间挑水卖钱,将所得收入存入竹筒,最终将积攒的钱款全部捐献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如今已是电子支付盛行的时代,储蓄罐也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可在百姓的记忆里,曾经那一只只圆滚滚的储蓄罐,分明储存过希望,储存过力量,也储存过我们一点一点投进去又不得不打碎的旧时光。

